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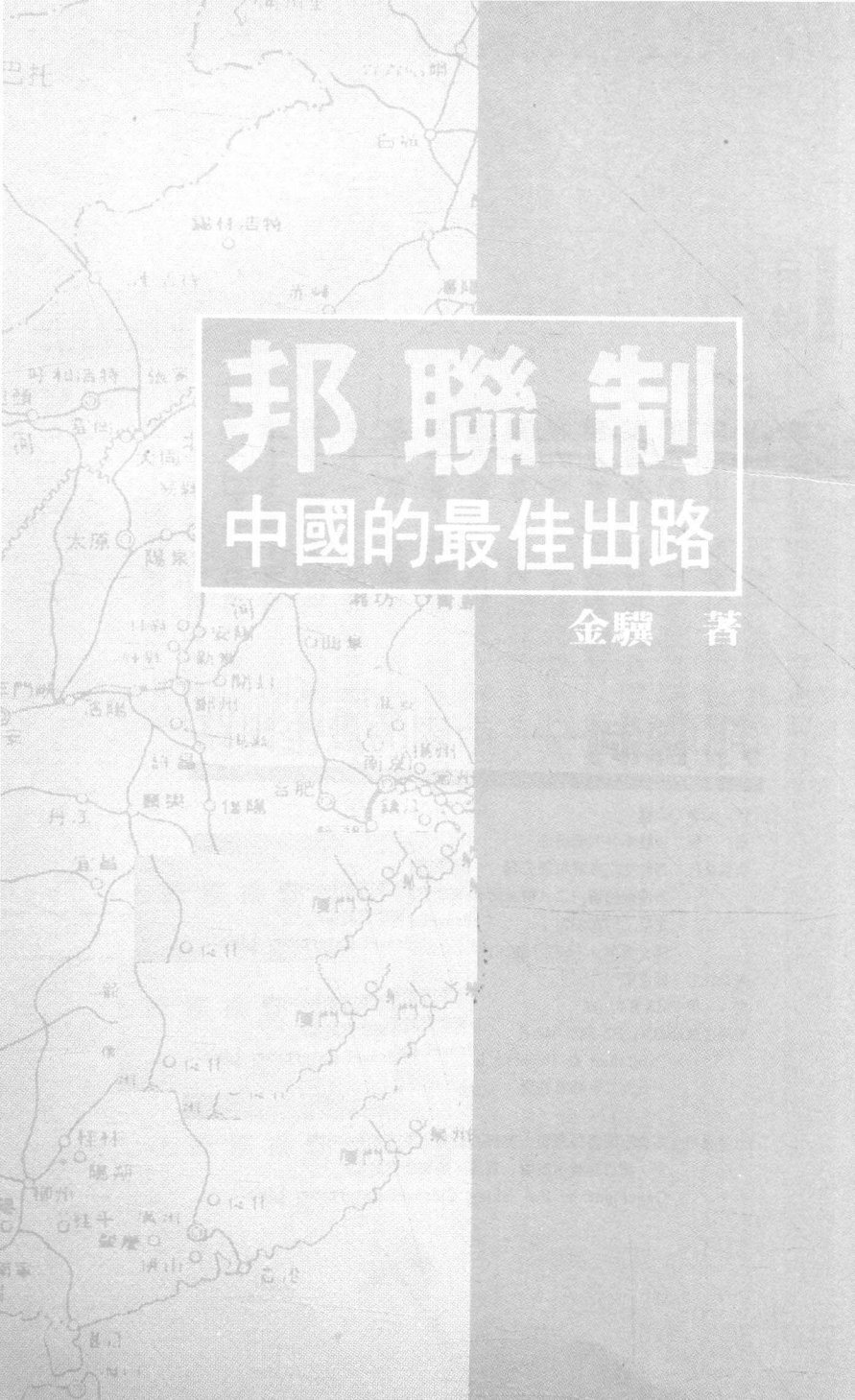


邦聯制

中國的最佳出路

金驥 著





邦聯制

中國的最佳出路

金驥 著

邦聯制——中國的最佳出路

作者：金驥

編輯：百姓半月刊編輯部

出版發行：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一二八號希雲大廈5字樓F座

電話：5770232

圖文傳真：(852) 8956184

封面設計：楊志堅

定價：HK\$40.00

國際書號ISBN:962-343-042-6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九九二年四月初版

版權聲明：本書版權不得侵犯，非經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同意，擅自轉載、出版、翻譯，將被法律追究。

Copyright by Pai Shing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序 民族罪人乎？歷史功臣乎？

民族罪人乎？

維持主權
分散治權

在蘇聯帝國崩潰以後，中國已是最後一個古老帝國，當全世界都正在拋棄帝國觀念，放棄依靠武力維持大統一的時代，中共的大一統必會受到猛烈衝擊。目前大陸少數民族地區行政面積佔中國總面積的百分六十四。各主要少數民族都有獨立意向。在這種情況下長期保持高度統一幾乎已不可能。中國正在滑向分裂。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分裂，每次分裂都造成巨大破壞。筆者不贊同各少數民族都脫離中國並認為拯救中國最佳辦法是實現邦聯。邦聯分散治權，維持主權統一，是在差異較大的多民族國家中保持統一的最佳模式。少數民族多可接受邦聯模式。

蘇聯及南斯拉夫同為多民族國家。兩國共產黨統治崩潰後都迅速走向分裂。南斯拉夫的少數民族要求平分治權，成立邦聯，為中央政府拒絕，導致四個共和國宣佈獨立。蘇聯十國總統致力

於組成邦聯性質的新聯盟則還有可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統一。蘇聯的變化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所以更有必要盡早宣傳邦聯思想，為各地各界人士指明出路。

印度已實行民主四十年，但因全力維持統一的聯邦制度，使民族矛盾激化，同樣滑向分裂。這足證民主不能保證國家統一，聯邦制也不能化解尖銳的矛盾，唯有邦聯是出路。

邦聯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唯一出路。在邦聯制下國民黨可維持其在台灣原有全部治權，又可成為統一的中國中一支重要力量，更多地參預大陸內經濟活動。宣傳邦聯思想可促使中共省以下幹部及黨員中絕大多數接受或推動各地自治，促成各地保境安民，避免內戰，同時削弱中央集權體制，使各省得到發展機會及空間，使大陸走向多樣化，並因此而得到邁向民主化的機會及條件。

宣傳邦聯思想也有助於為香港開出一條生路，使香港在未來得到更多自治權，成為未來中國中一平等成員，使港人看到希望。

中國的大一統體制及觀念已過時，應進行深刻的反思，找出新的解決辦法。筆者正是因此而廣泛研究古今中外眾多經驗並撰成此書。筆者主觀上傾向維持統合，行文中秉持中性立場，絕無為任何黨派之宣傳。

中共如繼續使用武力鎮壓少數民族及阻擋民主化的洪流，中國大陸必然步蘇聯之後塵，走向

分裂，陷入混亂，不可收拾，甚至解體。中共因而成爲民族罪人。中共如順應世界潮流，走向民主，採用邦聯，則可拯救中國，維持統一，而成爲歷史功臣。民主與邦聯似爲中國今日唯一的出路。筆者兩年來撰寫此書正是期望各界抉擇，促成邦聯。

神州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又一次面臨最危險的時刻，何去何從，生死攸關。最佳出路只有一條——神州邦聯。

本書承 IECEC 基金會資助，由百姓出版社出版，對此二組織及其同仁，作者持致誠摯之謝忱。

目錄

序：民族罪人乎？歷史功臣乎？	1
第一章：民族矛盾正在激化	1
第二章：軍事藩鎮早已林立	31
第三章：經濟諸侯迅速崛起	46
第四章：農村流民日益增多	72
第五章：獨裁體制難以維持	84
第六章：邦聯制可避免內戰	95
第七章：邦聯制可促進多元化	105
第八章：邦聯制可化解民族紛爭	116
第九章：邦聯制有利經濟發展	129
第十章：邦聯制可促使臺、港、外蒙走向統一	140
第十一章：邦聯制有助於走向民主	148
第十二章：神州邦聯國防	157
第十三章：神州邦聯外交	162
第十四章：復興墨學	167
第十五章：世界的潮流	175
後記：蘇聯解體後的中國	186

第一章 民族矛盾正在激化

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一九九一年宣佈，大陸現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已成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的行政管轄面積超過六百一十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的百分六十四。漢族地區行政管轄面積只佔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六。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據一九九〇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宣佈大陸現有少數民族九千一百二十萬人。人口總數低於十萬的少數民族有二十七個。人口總數高於十萬但低於百萬的少數民族有十五個。高於百萬的少數民族有十八個。在這十八個少數民族中居住比較集中，在較大地理範圍內構成主體民族並擁有省級自治區的只有蒙古、回、壯、維吾爾及藏五個民族。這五個民族與中共中央政權都有矛盾。在海外衆知最多的是藏族與中共的矛盾。

但至邊境地區
加之人口流動
民族問題更

藏，轉居青海。達賴一系則不再承認班禪封號。

當班禪在青海宣佈擁護中共時，在拉薩的達賴十四世並沒有效法。此時的達賴名為丹增嘉措，年僅十四歲，尚未親政，而由大札攝政。以大札爲首的許多藏族官員希望西藏能像外蒙一樣獨立，不願接受中共管轄。大札還將藏軍的三分之二調至昌都，沿金沙江設防，不惜以武力阻止中共軍隊入藏。

中共則不惜以武力迫使藏族就範。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的西南軍區在聚集重兵後於一九五〇年八月發起昌都戰役，十七天內便全殲了藏軍主力。昌都戰役後，中共並沒有乘勝揮師入藏，而是勒馬金沙江邊，催促藏方派人上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事宜。

藏區僧俗官員眼見天險已破，大門已開，實在無力阻擋中共進藏，大多上書達賴，請他親政，以改弦更張。攝政大札在衆人壓力下被迫於五〇年十一月下台，十五歲的達賴因此提前親政。達賴主政後首先於五一年二月任命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等五人爲代表，上京和談。

阿沛等人於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與中共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該協議主要內容爲藏政府一切涉外事宜改由中共中央政府「統一處理」；所有藏軍「改編爲人民解放軍」；「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及達賴固有地位和職權不予變更」；藏民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份保證。也就是中共只管外交、國防，其他均由藏政府管轄。①

此時中共有關少數民族的政策主要由周恩來主持制定。周恩來認為，歷史上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互有殺伐，但總的講，漢族欺壓少數民族居多，漢族欠下少數民族許多債。漢族已居於優勢地位，有必要幫助少數民族發展，以償還舊債。此一「還債」政策避而不談民族自決權原則，力圖通過施恩籠絡滿族征服過的各少數民族，旨在維持滿族建立的大清帝國的版圖。這一「還債」政策得到毛澤東首肯，成為中共立國初期民族工作的基本內容。

正是由於這一政策，中共在粉碎藏軍昌都防綫後並沒有殺入西藏，而是轉而以拉攏為主。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北京對前去造訪的達賴說：「我支持您搞西藏建設二十年。」毛澤東並表示，在中共紅軍長征經過川西藏區的最艱難時日曾得到藏民支援，中共為此一定報答藏族同胞。周恩來的民族政策及毛澤東的諾言都給達賴留下極深的印象。達賴不僅從「有所懷疑」轉為擁護中共，甚至想成為「半個和尚，半個共產黨員」。^②

但達賴還未來得及成為共產黨員，中共政策已經出現變化。一九五六年以後，隨着中共各項政策全面左傾，「還債」的民族政策也被加以修改。中共提出「幫助各少數民族先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③

這一「幫助」則實為照搬中共在內地已完成的強迫性「社會主義改造」。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造」在程度及範圍上雖有所緩和，但基本精神完全相同。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更使許多中共官員「發燒」，紛紛要求在西藏——這唯一沒有完成「改造」的地區——加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但此時中共以大軍壓境迫使藏政府簽訂的八十七條協議則束縛了中共的手腳。因為八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舊制不變，西藏內部事務由藏政府決定，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由西藏人民及與人民有聯繫的領袖人物考慮確定。如公開撕毀八十七條協議，中共官員仍覺有失顏面，所以中共官員採用不公開的手法，插手西藏內部事務。

中共干涉西藏內部事務，危及政教合一的西藏體制。較為激進的藏民組織起衛教軍，以維護黃教對西藏的統治。五九年三月十日，藏民走上拉薩街頭，公開抗議中共違反八十七條協議。中共立刻借機調兵鎮壓，並宣佈「達賴集團發動武裝叛亂」。

達賴在中共政策左傾之後曾兩次寫信給毛澤東，並於五六年在印度當面向周恩來提出，希望中共信守諾言。周恩來親口答應，西藏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仍由達賴決定。時年已二十五歲並正在想加入共產黨的達賴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去「策劃叛亂」。

部份不明全局的藏民確有過激行為，但藏軍主力在五〇年已被中共全殲，藏族官員明知根本無力與中共大軍對抗，更不會以卵擊石。藏軍司令拉魯便是在拉薩家中睡覺時被中共軍隊逮捕，以後又被押上布達拉宮以供中共拍攝其指揮叛亂的電影。達賴如果不是在收到去中共西藏軍區看演出的邀請後立刻逃到山南，也會成為階下囚。

中共的食言及嫁禍與人的作法激起藏民的抗議及武裝反抗活動。這些反抗活動多以寺院爲中心。中共則以武力相回應，甚至不惜出動大軍攻打寺院，屠殺僧衆。名叫阿木曲呼的古寺竟被中共空軍戰鬥機炸毀。這種毀寺殺僧的暴行在藏族人民心中刻下深深的傷痕。

達賴率十餘萬藏族僧俗出走印度後，中共立刻廢除十七條協議，在全部藏區進行所謂「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政治方面完全摧毀已經沿襲八百多年的政教合一且完全自治的體制。中共於一九六五年建立起西藏自治區，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爲自治區主席。但實權仍操在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手中。自治區各主要部門的首長均爲中共現役軍人。

在經濟方面，中共通過「三反」、「三算」，全部沒收寺廟及私人擁有的所有生產資料，轉歸中共政權所有。

中共極力宣傳，「民主改革的意義在於從根本鏟除了人身依附關係。千百年來被當作會說話的牛馬的農奴和奴隸掙脫了身上的鎖鏈」。實際上，中共取而代之的是更爲專一的人身依附的關係，即全部藏民被迫完全依附於中共政權，「百萬翻身農奴」，成了中共「不會說話的牛馬」。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藏區更受到進一步的破壞。所剩不多的寺院又受到紅衛兵的洗劫。黃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也被砸毀。班禪系統活動中心的札什倫布寺中歷代班禪靈塔均被

搗毀。一向緊跟中共的班禪十世亦在北京遭到批鬥，最後被投入秦城監獄。一般僧衆境況更慘。六千多所寺院大多被毀，文化革命後只剩下五十三所。

極左狂潮還驅使駐藏中共幹部強令藏民「學大寨」，「重新安排西藏山河」。西藏地處高原，自然情況與內地迥然不同。盲目地建「大寨田」，導致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大片森林被亂砍亂伐。「大寨田」所收糧食不多，取暖燒柴亦出現短缺，溫飽均成問題。西藏原本缺少能源，藏民無柴可燒，只好燒牛糞。結果，拉薩的牛糞價格很快超過奶酪。

文化革命使大陸整個經濟瀕於崩潰，百業凋敝，西藏的境況則最慘。「民主改革」後二十後，中共在西藏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每年不足一億元，還不如中共在內地一個中等城市的投資多。而這很少的投資又多用於以防衛爲主要用途的建設，所以西藏幾無受益可言。文化革命結束時，西藏仍無工業。農業也遠遠落後於大陸內地各省。一九八三年，西藏農民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民幣，在大陸各省區中倒數第一。

一九七八年後，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逐漸掌握中共領導權，並開始清算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盛行的中共極左路線。以文化革命後復出的中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楊靜仁爲首的中共負責民族事務的幹部也開始檢查多年來極左的民族政策的結果，並加以反思。

一九七九年，中共自我否定了此前二十年一直盛行的「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觀點，

承認其在「民族關係上以階級鬥爭爲綱，導致在處理民族關係各種問題中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損害了民族關係，破壞了民族團結」。④

隨後，中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地釋放了仍在押的近千名所謂參加五九年叛亂的罪犯，解除了七千名因所謂參加叛亂而受「改造」的監督，並爲這些人「摘掉叛亂犯的帽子」，「發給摘帽通知書」。

流亡海外的達賴目睹中共的變化，又重新產生希望，於七九年開始與中共秘密接觸，試探中共是否允許達賴返回西藏。鄧小平同意達賴回國，並許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一職，但不許其回西藏，只准居住北京。達賴最不願去的就是北京，秘密談判不歡而散。

一九八〇年五月，胡耀邦及萬里等人同赴西藏視察。胡耀邦親眼見到西藏的嚴酷現實後，公開承認「民主改革」二十年並沒有使藏民生活好轉，而在宗教及文化方面中共傷害了藏族人民，並點明這是中共西藏地方當局長期推行極左路線造成的結果。

胡耀邦隨後解除了仍爲現役軍人的西藏中共第一書記任榮的職務，命陰法唐接任，並制定六項具體任務，以清除極左路線。這些任務包括：修復寺廟、恢復宗教活動、請昔日藏族僧俗官員復出參政、大批撤退駐藏漢族幹部。

進藏多年的漢族幹部眼看自己親手下下去的藏族僧俗官員紛紛復出，自己親手封掉毀掉的寺

廟又重新修復，自己畢生的業績全被否定，各種特權逐漸失去，無不怨氣冲天，大罵胡耀邦瞎指揮，是「胡鬧幫」，並有意抵制胡耀邦制定的任務。

在京的部份中共官員也對胡耀邦多有不滿，認為羈縻之策用之過度。他們認為對藏人不可太信，更不可放手任其自流。他們主張對藏人應有適度監控，甚至連一生追隨中共的班禪十世也不例外。班禪的言行舉動都受到中共統戰部的注意。班禪的講話在公佈時還要受到統戰部的審查，甚至扣押。班禪得知這些則氣得大罵，並找鄧穎超訴怨。

胡耀邦發現所定懷柔措施並未落實，又於八四年二月在北京召開西藏工作會議，再次批左。同時，胡拍板決定撥出相當於中共二十多年在藏基建投資總額的二十億元資金，一舉在西藏興建四十三項工程，以求速見效，並為八五年的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慶典裝點門面。

胡耀邦深覺駐藏漢族幹部思想仍很僵化，不時作梗，便於八五年再次換馬，撤掉陰法唐，任命四川的彝族幹部伍精華為中共西藏黨委第一書記。伍精華有負胡耀邦厚望，不但沒有給西藏帶去新氣象，反留下「能力不强」的名聲。部份藏人則對中共從發展程度尚不如藏族的彝族中選入治理西藏大為不滿。伍精華本人也覺力難從心，不願久留西藏，只望進京改做京官。

中共的一再食言，左右搖擺，前後不一打破了達賴及其他昔日藏政府僧俗官員七九年後升起的希望，也令五九年後中共培養的藏族共產黨幹部寒心。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快悟出真理，發覺自

己錯跟了共產黨，作了不少孽，因而每日下班或退休後都去寺院「轉經」，以求贖罪。八五年中共整黨時發現大多數藏族共產黨員公開信仰喇嘛教。中共爲此大傷腦筋，左右權衡處置辦法。最後，爲不增加「不穩定因素」，中共只好讓信教的藏族共產黨全部重新登記入黨。

「百萬翻身農奴」中的部份人在「民主改革」得到生產工具及土地時也曾有過一陣喜悅，但很快發現中共與歷代入藏行騙的漢商頗有相通之處，均是不守信，不講義，朝秦暮楚。但有一點不同。歷代漢商，包括漢族軍人都不敢冒犯神靈，有辱寺僧。中共不但最不敬神，而且大開殺戒，毀寺殺僧。藏族全民信佛，已逾千年，極其虔誠。藏民甚至一步一叩地行千里去寺廟「朝佛」，並將全部收穫「敬佛」。而大講「精神萬能」的中共在藏區的失誤恰恰是低估了精神的作用。他們以爲把寺院的田地、資產分給農奴，農奴就會感激中共，轉而擁護中共。結果卻正相反。藏民的精神追求遠遠超過物質欲望。他們世世代代甘願以自己的勞動收穫去換取精神享受。中共的抑佛政策不但沒有贏得藏族人民，反而傷害了他們。中共的毀寺殺僧更是留下無法洗刷的惡名，並加深了藏民對佛教的信奉。

中共於七九年鬆動其統治後，藏民壓抑許久的宗教情緒立刻迸發出來。班禪每次入藏區都能引出萬人空巷，其氣氛近於狂熱。班禪實在無法爲衆多善男信女一一摸頂，只好抬起手臂，讓人潮從下湧過。達賴的照片也無所不在，藏民敢於公開供奉。